

## 鄧小平與七千人大會

● 鍾延麟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學者從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最常面對的難題就是資料的不足、斷裂甚至空白。研究涉及的菁英愈高層，這種情形愈頻繁出現。此與中共官方與史家處理重要歷史人物的做法有直接的關係：對於功在黨國的正面人物，揚長避短、只褒鮮貶，務使其生平爭議處無礙於總體之評價；對於負面的人物，攻其一

點不及其餘，不惜其一生之清苦俱無。再加上，中國大陸對官方檔案開放的多重限制，更讓海外的研究者欲「正本溯源」而不得。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出版的當代中國史著作，其中首次使用、徵引以及曝光的資料，正是彌補相關人為缺憾的重要渠道和來源。張素華所著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以下簡稱《變局》，引用只註頁碼），即是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之後，另一部在資料提供上別有份量的著作。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向來為中共所強調與宣傳，以證明執政黨在歷經政策不當而遭受挫敗後，上及層峰下至基層，仍能齊心一致、知錯能改，進而卸下包袱，繼續引領國家與民族克服難關、勇往邁進。有關此會的回憶文章與研究論文雖不在少數，但是以此為主題的研究專著，張素華的《變局》無疑是第一本。張著論及「七千人大會」召開的緣由、會議的籌備經過、議程的發展與變化、主要領導人的講話和背景、會議的成果與後續效應等，為認識「七千人大會」提供一個全景式的介紹。在張氏平實的文

張素華的《變局》論及「七千人大會」召開的緣由、籌備經過、議程的發展與變化、主要領導人的講話和背景、會議的成果與後續效應等，為認識「七千人大會」提供一個全景式的介紹。

針對人民公社問題，鄧小平「唯毛是瞻」，迥異於陳雲及劉少奇的看法，既擺明了其對毛澤東仍篤信的立場，將問題提升到「跟主席走」的高度，也堵住其他可能的異議之聲。

字、敘述以及布局之下，讀者能輕易地了解、掌握「七千人大會」的史實內容、過程與影響，而確有不虛此讀之感。

張著受人注目之處，還在於使用大量過去未曾面世的各種資料，包括：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書記處會議、各中央局書記會議、以及其他重要會議之相關記錄的檔案；作者對當年參加會議者的訪談紀錄……。以上種種資料，除可作為張著立論的厚實基礎，更可進一步地為中共黨史，特別是中共菁英要人的研究，供以重要的新材料與線索。易言之，此一「七千人大會」研究成果的落腳點，正是中共黨史人物研究的一個出發點。

有關「七千人大會」的主要關鍵人物，眾所周知的是：對先前「大躍進」難辭其咎、亟思化被動為主動的毛澤東；因直言不諱而開罪「聖上」的劉少奇；還有發言別出心裁、適時護駕解圍的林彪。至於其他人的角色和與聞程度，則是模糊不清。張著為此打開了一個缺口。其中，最重要、亦是最大的突破是關於時任中共中央常委、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的部分。

鄧小平是「七千人大會」的重要參與人和組織者，關於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的活動，中共官方最大書特書的是鄧小平在大會上所作的公開講話，以為是講述「民主集中制」的經典談話（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163-69）。鄧小平想必也甚為滿意，後來將之收入於被其看作是自身「政治交代」的《鄧小平文選》之中（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上的講話〉，載《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97-317）。除此之外，着墨不多、討論甚少。然而，藉由張著中提供的資料，對鄧小平於「七千人大會」前後與期間在若干重大問題上的立場與作為，可得到一定程度的釐清與辨識，包括：鄧小平當時對毛澤東的態度、鄧在會議中貫徹毛的意圖、鄧與「七千人大會」召開根源——「大躍進」運動之間的緊密聯繫，以及鄧與地方大員的互動情形。

首先，是擁護毛澤東的立場與程度。

林彪在大會上力挺毛澤東的講話，讓一度因挫折而心緒低迷、形單影隻的毛澤東，如獲知音與奧援，因而深得毛的高度好評。林此舉常被看作是惡名昭彰的政治投機行徑。鄧小平如何待毛？張著對這個問題給予了解答：鄧小平縱不同於林彪的機關算盡、公然向毛示好，他也沒有像劉少奇那樣以略帶刺激性的語言直率地表達觀點。他選擇的是在不公開的場合裏積極支持毛澤東。

在「七千人大會」的籌備階段，鄧小平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常委提交書面報告，檢討由其領銜的中央書記處在此前幾年的工作，以表明應為運動的失誤負起責任。雖然沒有公布其具體的文字內容，但張著首次揭露該報告的主要論點以及鄧小平對該報告的說明。其中，鄧小平指出：「總的說來，毛主席歷次反映我們根本路線、政策的議論，是正確的，但我們有若干具體政策措施，與指導思想相違背」，「是許多具體問題、具體政策違背了毛主席

席的指導思想」。對於陳伯達與此同時奉鄧指示編輯而成的自「大躍進」以來的中央文件的輯錄，鄧小平也強調，經研究的結果，毛澤東在此一時期的語錄，作為黨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的指導思想，沒有錯誤（頁36-39）。

據吳冷西回憶，毛澤東對於鄧小平所提交的書記處報告曾表示：你書記處寫了一個報告，甚麼都是執行我的指示，理解不深，執行不夠，執行也有偏頗，你們把我當成聖人，不是閒人已經不錯了，你們不批評我，我自己也要作自我批評（吳冷西：〈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者〉，載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17，下引簡稱「吳冷西」）。話雖如此，毛澤東對於鄧小平在相關檢討和研究報告中悉心護主的用意，豈會不曉、不感受用。

此外，「七千人大會」期間，為討論修改劉少奇大會報告稿而成立的「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在其開會議論的過程中，圍繞在人民公社的問題上，鄧小平表示：

人民公社如果經過試點更好。既然早產了就應當好好愛護他，對早產的孩子有四種態度，一是不要，這是右派；二是對付對付，不認真；三是拔苗助長多給豬肉吃，多運動。這三種態度都不對。主席的態度是重視他愛護他，想辦法解決問題。四種態度跟哪一種走？當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頁111-12）

針對人民公社問題，鄧小平這種「唯毛是瞻」的態度，迥異於陳雲

認為的容許他人懷疑幾年，以及劉少奇的現在難講其優越性的看法，既擺明了其對毛澤東仍篤信的立場，將問題提升到「跟主席走」的高度，也堵住其他可能的異議之聲。

綜上所述，過去海外流行的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夥同劉少奇，不站在毛澤東的這一邊而令毛不快的說法，至此可休矣。

其次，是貫徹毛澤東對於會議的意圖。

張著中清楚顯示：「七千人大會」期間，鄧小平不時將會議的動向匯報予毛澤東，使之全盤掌握輿情，也每應毛的指示調整會議的議程，協助毛將會議導向為其所願的方向。有關鄧小平貫徹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的旨意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會議經毛澤東引導出氣抒怨後，毛要保住仍為其所信任之「封疆大吏」的職位。鄧小平擔負的是一頗具爭議性的任務——出面替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緩頰。

因為李井泉的狂熱（如李被稱為四大「左王」之一；李因常與上海柯慶施相呼應、唱高調，時人有「長江上游下游口號高」的說法），「大躍進」期間的「天府之國」受難極重，非正常死亡人口達千萬，民怨對此尤大。着眼於李井泉一貫對己的忠心緊隨，毛澤東無視李在川所犯下的巨大錯誤，要鄧小平代表中央表態挺李。由鄧小平出馬，乃因其本身為四川人，中共建政初又坐鎮西南，淵源深、威望高。此外，向來為人忽略的是，在「大躍進」勃興之時，鄧即曾赴當地鼓動躍進熱情、傳播蜃樓美景，就算不是為李井泉所作所為背書，也是為之開了綠燈。李井泉為了要向中央評功擺

會議經毛澤東引導出氣抒怨後，毛要保住仍為其所信任之「封疆大吏」的職位，並要鄧小平代表中央表態力挺在「大躍進」期間犯下巨大錯誤的李井泉。在鄧小平不辱上命的庇護下，李井泉竟得以繼續安做「西南王」。

在中央書記處內協助鄧小平負總責的彭真，在談到「大躍進」肇禍的原因時表示：1960年的毛病出在沒有調查研究，首先是我們書記處。小平帶頭，沒有調查研究。彭真直指鄧小平在部署運動上不但沒有起到務實的表率作用，反而做出脫離實際的惡劣示範，更顯出資料的可靠性。

好，經常不顧在地的需要，對於中央下達的已屬失實的高額糧食指標（其中也含有李的誤導），搶先承包，支援所謂的全國「大局」，徒令四川缺糧危機愈加惡化。鄧小平和其統領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中央主議糧食估產、汲取及配置事宜，其在運動期間與好大喜功的李井泉等主要地方負責人之間，實質構成了上下「一搭一唱」的密切關係，在相關責任的劃分上，彼此也很難釐清。直言之，鄧小平力保李井泉，主要是承上為公，也不可完全排除有私人因素。

事實上，正因鄧小平持保李立場參加四川組的會議，不免遇到該省與會者的消極回應。故與同一時間其他中央領導人到他組的情況相較，顯得阻力較大。如同《楊尚昆日記》的記載：「由於少奇、恩來同志坐鎮安徽、福建，這兩省已經慢慢地展開了，向省委領導上初步提出了些意見，還待深入。四川省雖有小平參加，似乎並未展開，而且兩次冷場！」（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119。）可以想見，鄧小平絕不會因其保李訴求響應不熱烈而自我調整、放棄成命；相反地，鄧必是仗其威信、憑以黨律，迫不理解的照樣接受，並在接受後加強理解。在鄧小平不辱上命的庇護下，李井泉竟得以繼續安做「西南王」。

第三，是鄧小平與「大躍進」運動的密切關係與責任干係。

中共官方黨史出版物論及鄧小平和「大躍進」關係時，「標準」的做法是含糊帶過鄧在此運動醞釀、發動和開展過程中的涉入情況，甚至明明是相關細節的不好見世，卻表

示這是鄧採取「沉默」的方式對「大躍進」進行抵制。西方論著雖然注意到鄧小平及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在推動「大躍進」中的關鍵地位，但囿於資料的限制，也無法細究。這方面可從張著中獲得一些零散但不失重要的線索。除了前述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的檢討報告，鄧在1961年春所作的自我批評的首度公開，亦是觀察、檢視其在運動中所負職責的重要材料：

從中央到地方都有缺點，中央應當負擔主要責任。57年以後，中央的具體工作由書記處主持，作為中央常委和主席的助手，工作沒有做好，日常工作做得不壞，但方針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如鋼鐵的第二本帳，糧食數量、公社規模等，我們都參加了意見，贊成了的。（頁195）

在中央書記處內協助鄧小平負總責的彭真，在談到何時是「大躍進」肇禍的關鍵時期時說：1960年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大出口，基本建設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彭真更快人快語地表示：1960年的毛病出在沒有調查研究，首先是我們書記處。小平帶頭，沒有調查研究（頁107）。由身為鄧小平副手的彭真，直指鄧在部署運動上不但沒有起到務實的表率作用，反而做出脫離實際的惡劣示範，更顯出資料的可靠性。

對於以鄧小平掛帥的中央書記處在「大躍進」中扮演的角色，無論在中央和地方都不乏微辭。在煉鋼問題上，陳雲在批評王鶴壽時即意有所指地表示「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幹

勁，到總理那兒講困難」(頁106)。可見以鄧為首的中央書記處追求鋼鐵指標的熱衷。與此相關地，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認為錯誤的責任主要歸咎於中央，尤其是中央書記處，並對其檢討不甚滿意，認為「不深刻」(頁71)。陶鑄之所以跳出來責備中央書記處，必與中央書記處過去透過中央電話會議在催促煉鋼問題上對之造成巨大壓力有關。

若根據上述張著中所透露，有關鄧小平和其麾下的中央書記處在「大躍進」中造成的負面影響與連帶責任，再重新看待鄧小平在1980年回首「大躍進」時言己當年「頭腦也熱」、「沒有反對」，必能覺得鄧小平倡之「宜粗不宜細」所含的避重就輕之嫌。

再次，是鄧小平與地方要吏的互動情形。

「文革」前鄧小平所任之中共中央總書記，乃居於中共黨國機器中承上啟下之樞紐。對於中央層峰的指示與決定，鄧小平為了要上令下達，經常要與各方大員聯繫與聚首，再加上鄧小平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其同各地首長互動、接觸甚為頻繁，其間培養了密切的工作關係與公私信誼。這使得鄧小平在中共政治運作中佔有一特殊而不可或缺的位置。

以「大躍進」為例，在運動上揚和掀起高峰的階段，鄧小平屢屢代表中央糾集、激發地方的熱情和幹勁；在運動出現過熱、偏斜之時，鄧小平則忙於對之抑制和引導；當運動呈現遲滯或難以為繼，鄧小平又要對不復豪情的方面大員振衰勵志、指派任務。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正是基於此一背景。

張著多處披露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中與各地「一把手」商議甚至爭辯的言談資料。一方面，可以看到鄧小平較為人所熟知的重於「集中」的強勢政治風格和令到行止的決心；另一方面，也難得可見鄧小平在討論、交涉過程中遇到他人的辯駁與質疑。例如：針對「七千人大會」報告稿中是否將分散主義視為主要矛盾的討論，對於鄧小平把各行其事的分散主義看作「道德品質有了問題，走黑路」，等同資本主義思想、有可能造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看法，中央和地方兩棲的彭真，以其北京市委之首的身份明白表示反對(頁100-103)。陶鑄對於「大躍進」後困難產生的原因的議論，更直截了當地不同意鄧小平作出的有壞人破壞的判斷，指出對此不能過份強調(頁108)。彭真、陶鑄敢對鄧小平的意見、工作當面提意見，然彼此的合作關係後續卻毫不受影響，適足顯示他們相互之間的信任、默契以及欣賞。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鄧小平當時在議政論事和與人處事上存有「民主」作風的一面。

讀者在張著中只見鄧小平在正式議場中不厭其煩、甚而舌敝唇焦地與地方要員周旋，促使後者能配合中央一致行動。從吳冷西的回憶，卻能發現鄧小平在會場外的另一種游說。吳表示：

應該講小平同志還有一個特殊的作用，是他來自地方，過去和各中央局、省委的同志關係很熟，所以他利用這種關係來溝通中央與地方的思路，這個作用是別人所不能代替的。開七千人大會期間，中央局和省委書記都住在北京飯店，他每天

張著多處披露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中與各地「一把手」商議甚至爭辯的言談資料。一方面，可以看到鄧小平較為人所熟知的重於「集中」的強勢政治風格和令到行止的決心；另一方面，也難得可見鄧小平在討論、交涉過程中遇到他人的辯駁與質疑。

晚上都要去，或者是聊天，或者是打台球，就在這個來來往往中間，把中央和各省的思路都溝通了，這個作用是別人不能起的特殊作用。（吳冷西，頁320）

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中應對、說服地方大員時，展現的「有冷有熱」、「有硬有軟」，體現出鄧小平不凡的領導藝術與技巧。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代表中央與地方打交道所得所獲的經驗和人脈，以及此一時期其對黨組織和運行的嫻熟，乃是鄧在「文革」前所積累的

重要政治資產，亦是鄧在毛後問鼎江山的一大資本與憑藉。

除了前面聚焦討論的鄧小平以外，張著也對中共其他領導人，如彭真、柯慶施、李井泉、陶鑄、王任重、劉瀾濤……等，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的活動提供了多少不一的翔實、生動的紀錄和材料。雖然未竟全貌，但較諸以往中國大陸相關文獻的空乏，張著已是難能可貴。藉由張著提供的資料，引發對鄧小平等中共要人做探索性的思考，或許是對中共黨史人物研究帶來一學術意義的變局的開端。

## 筆力萬鈞

### ● 王弼福

馮象以「樸素、聖潔、雄健而熱烈」來形容《聖經》的語言，其譯註的《摩西五經》，直接從希伯來文《聖經》翻譯過來，卻一點不見翻譯的痕迹，而且全書文采斐然，賞心悅目，呈現了《聖經》文學的萬千氣象！



馮象譯註：《摩西五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 一

馮象先生的「象」字，應是氣象萬千的「象」；由馮象來翻譯的《摩西五經》，果然呈現了《聖經》文學的萬千氣象！他不但是哈佛的中古文學博士，還是耶魯的法律博士，「摩西五經」（為《聖經》首五卷書《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的合稱，以下凡列明經文出處，會用創、出、利、民、申的簡稱，中文數字為章數，阿拉伯數字為節數，如「創九12-16」，即創世記九章12至16節）又稱「律法書」，所以可戲稱這是一趟「門當戶對」的翻譯。